



住房条件:真正有效的治疗

联合摄影展:

Pascal Bachelet / Médecins du Monde

1993年11月的巴黎街头，平均气温为零下**5.4**摄氏度，数百人却因没有住宿的地方而在街头过夜。为了应对巴黎住宿设施的不足，世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du Monde**）在巴黎十区的人行道上搭建起一顶大帐篷，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基本的照料。同时，世界医生组织也呼吁巴黎市民团结起来，共同参与援助。

“无家可归者”项目，即之后的“没有住所就没有健康”项目就此诞生。

从那时起，世界医生组织几乎每天都会走访巴黎的无家可归者，倾听他们的声音，给予其关怀，并提供医疗援助和社会支持。**30**年来，世界医生组织一直在向公众和当局呼吁，指出巴黎在接待和照顾无家可归者方面的不足。

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无家可归者面临的状况依旧十分严峻。根据阿贝·皮埃尔基金会（**Fondation Abbé Pierre**）的数据显示，法国有超过**33**万人无家可归，这一数字是十年前的两倍。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街头生活的条件艰苦，加之无家可归者权益难获保障、获取医疗服务阻碍重重，流浪者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其中这条数据尤其触目惊心：无家可归者的平均寿命只有**49**岁，而其他人群的平均寿命为**80**岁。

在世界医生组织致力于帮助无家可归者的三十周年之际，本次展览旨在提醒大家继续改善无家可归现象的必要性。展览通过十四位无家可归或曾经无家可归且有健康问题的当事人的肖像及叙述，讲述了其日常生活的困难以及对政府失职的愤慨。

世界医生组织与当事人立场一致：结束无家可归现象迫在眉睫，人人都应平等享有健康医疗、住宿住房等基本权利。

Pascal Bachelet

摄影记者**Pascal Bachelet**希望通过社会题材的摄影作品见证、分享、展示并理解生活的真实面貌。他的照片通过**BSIP - Getty**机构以及各时事杂志进行传播。

Justine



我来到巴黎已经两年多了，从那时起我就经常在街头过夜。每次我都会尽量选择一些安全的地方，以避免遭受性侵。在这个公园里，我度过了很多时间：白天，我经常坐在这个长凳上，晚上，我会走得更远，躲到灌木丛后面。我患有血管炎：我的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炎症和关节疼痛。在医院里，医生让我尽量把脚抬高休息，以便血液更好地循环。但是，我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居住的情况下，怎么能做到休息呢？在我的包里，我总是带着这个文件夹。它收集了我曾经去过和仍在继续去的所有地址，以便获得医疗保险，并尝试接受治疗。这些地址有几十个；有些有用，有些没那么有用，有些地方待我很好，有些则不然。

Justine, 35岁





Anne

我在冬天的时候在街头度过了两个半月。那段时间非常艰难。我睡在车站的楼梯上。有时候，晚上我也会坐地铁或者乘夜班公交车，一整晚都这样乘车，直到第二天。我没法睡觉，因为我一直很害怕。我经常尝试拨打115求助电话，但要么电话响了几个小时无人接听，要么就被告知没有住宿的地方。在街头，我经历了抑郁。没有屋檐可以栖息于之下、没有工作、没有食物、没有医疗和没有卫生设施，我有时会想到死亡。我会想：'这算什么生活啊？'我曾经见过一个精神科医生，她给我开了药。但是我停了药，因为它让我犯困，而我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睡觉。这里，在我的脚边，是我为其他问题吃的药：我还有感冒、消化问题。

Anne, 39岁



Gustave



我已经84岁了，无家可归已经超过二十年了。我住在环城公路旁的一顶帐篷里。三年前，我在街头遭遇了暴力袭击，肋骨骨折，不得不在医院呆了两个月。从那以后，我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必须一直使用拐杖。拐杖帮助我挪动，还能减轻我的背部和腿部疼痛。遇袭之后，一个教区允许我在这个封闭的室外空间里睡觉。我喜欢在这里画画，比起住在养老院，我更喜欢在这里。我需要感到安全，尤其是在经历了那次袭击之后。

Gustave, 84岁





Daniele

我无家可归已经超过二十年了。我在巴黎四处流浪，然后在这座教堂前的广场上的这个长椅上睡了好几年。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身体还一直很好，但有一天早上，我在外面喝咖啡，突然间，我完全失去了视力，变成了盲人。之前，我有过几次不好的经历，所以我没有联系社会工作者，也没有医生。我只知道‘世界医生’组织，所以我去了他们那里。他们陪我去医院做了手术，我得了严重的白内障。我手里拿的这个壳子是为了在手术后保护我的眼睛，我必须戴好几天。如果我真的失明了，我就会从地铁上跳下去。我没有家人，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瞎了以后，在街头独自一人，我还能做什么呢？

Daniele, 66岁



Ibrahima



我无家可归已经一年多了。大多数时候，我都睡在街头。我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心脏问题、高血压、肾脏问题。我第一次在法国住院时，在重症监护室呆了两周，之后又不得不回到街头。现在，我每天要服用13片药。但由于无法休息且压力很大，这些药物并没有效果。当一个人每天服用多种药物时，他需要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他需要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

Ibrahima, 59岁





Kevin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睡过很多地方：有时在我女朋友家，有时在外面，有时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事实上，我并没有真正睡觉，因为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街头生活充满压力和恐惧；我曾被人威胁、殴打和抢劫。当我无家可归时，我一直在抽烟，每天喝四五瓶啤酒。我感到焦虑，这些让我平静下来。而且我没有服用那些帮助我平静的药物，因为我觉得它们对我不起作用。现在我有住处了，我减少了抽烟和喝酒，并重新开始了我的心理治疗。但我住在郊区的一间旅馆房间里，我不喜欢那里，房间很不卫生。我已经在等候社会住房的名单上待了七年了。我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住房。

Kevin, 28岁



Djia



几个月以来，我都睡在这座桥下的一个床垫上。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有快乐的时候，也有痛苦的时候。所有住在这的人都被市政府驱赶了。有时，我会偷偷回来这里喝酒。其实我知道，酒精对我没好处，他要么让我生气，要么让我平静过头。我手上的伤就是因为酒精搞的，我被玻璃割伤了。但我的生活里确实一直都有酒相伴，现在已经将近十年了。其实我想说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要总认为酒鬼都是坏人。人们应该和他们沟通，去了解他们在酒精背后的另一面。

Djia, 28岁





Mike

我在街上住了三年。去年，我找到了一个住处，但是几个月后，我就没有能力支付房租了，所以我又开始露宿街头。住在街上时，我的社保卡被偷了。如果没有固定地址，没有生活指望，重新办理一张卡是很困难的。所以几个月以来，我都没办法看病，这对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当我有了住处，我感觉就会好很多：我不再感到寒冷，睡得更踏实，我的背也不会痛了。因为生活变得稳定，我也终于能够重新申请所有那些被弄丢的证件。现在，为了能重新找到一个住处，我愿意付出任何努力。

Mike, 26岁



Mohamed



我已经50岁了，我曾在街上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这座桥下住了很久。我一直在工作：如果需要去市场，我就去，如果需要早起上班，我就会早起。即使在我露宿街头的时候，我依然在工作。工作让我能吃上饭，偶尔还可以买些小东西。以前我还喝酒，喝很多酒。后来有一天，我发生了意外，摔断了脚，进了医院，这毁了我的生活。出院以后，我又回到了街上，但我腿里有钢钉，还要定期打针和做渗透治疗。现在我已经戒酒了，但我还是个残疾人。身体残疾让我无法进行体力工作，因此我有很严重的经济困难，也无法领取补贴。

Mohamed, 50岁





Rabah

自从公寓的天花板坍塌以来，我已经在街上住了一年多了。晚上，我就睡在我兄弟工作的咖啡馆的椅子上。早晨，我会赶在客人来之前离开，而到了晚上，客人一走我就回去。我患有肠道疾病很多年了。对于得这种病的人，没有一个稳定住处是很为难，甚至是很危险的：我必须在不干净的公厕里更换我的造口袋，有时还是在我手很脏的时候，这很容易造成感染。我需要一个住处：在那里，我可以休息，洗澡，整理我所有的个人文件并且好好照顾自己。并且，我不必再随身携带所有这些东西了。

Rabah, 49岁



Ismaël



我已经住在街上三年了。我曾长期服药，之后开始吸食可卡因。现在，我已经戒了。但是我一直无家可归。我在这里度过了很长时间，因为这是我刚到法国去的第一个地方。因为寒冷以及风餐露宿的关系，我总是生病。最近我一直咳嗽，肺也很疼。所以我开始重新服药了，那是别人很久之前给我的，希望能让我觉得舒服一点。这些药物让我可以继续我的工作，我在一家餐馆工作。

Ismaël, 35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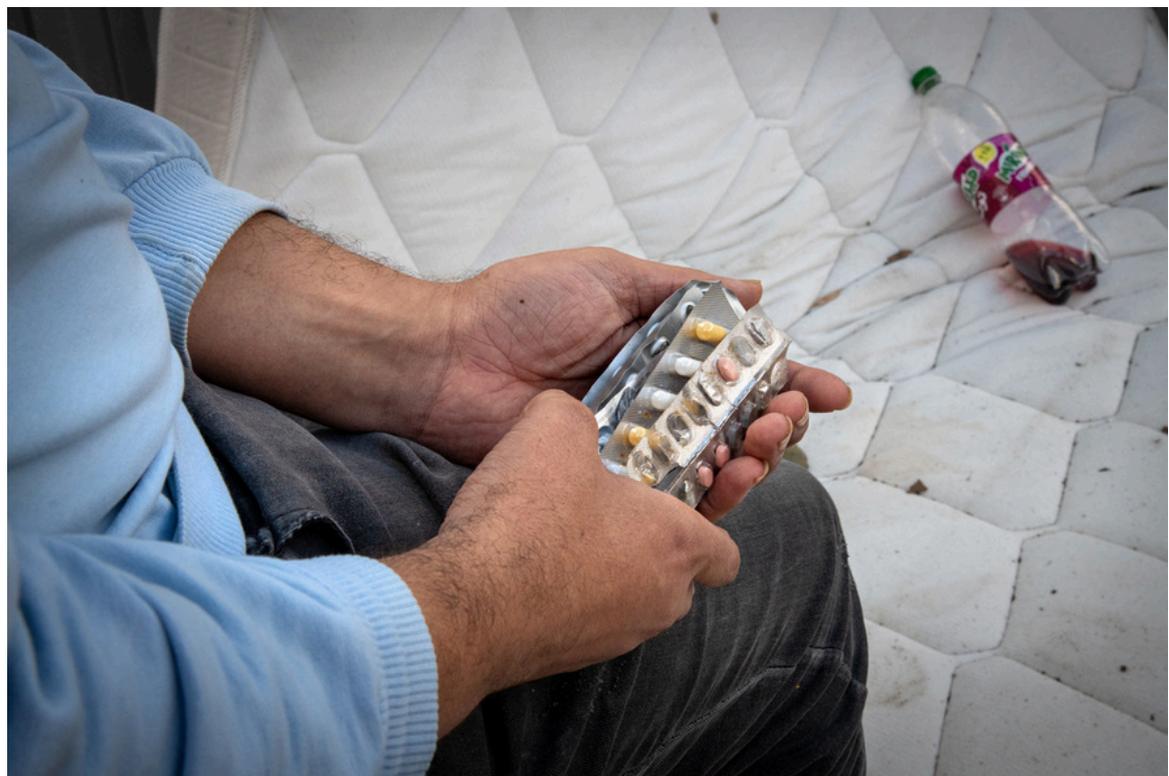




Manuel

如果有人说他们在吃药，特别是吃一些和精神疾病有关的药物时，这总会让别人觉得害怕，并且给出一些很不好的反应。我每天都要吃5,6种药，主要是用来治疗我的躁郁症，但即使患病，我从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暴力倾向。人们不该害怕我。是一位朋友把我带来这个十字路口的。两个月以来，我们都住在这里天桥下的一个帐篷里，就在贫民窟旁边。但是每隔两到三个月，市政府都会毁掉这些棚屋。其实我们都是很讲卫生的，也努力尊重我们居住的地方，不互相斗殴。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住处，但是因为迟交房租，我有可能会失去这个地方。我很勤劳，我在市场工作，每天都要要很早起床。但是因为物价上涨和经济危机，现在一切都变得很困难。

Manuel, 45岁



Sophie



我在巴黎的街头生活了20年了。以前流浪者的数量要少得多。如果你打115，你会立刻在庇护所找到一个能够收留你一周的床位。现在，想要一个床位变得很难了，就算有，最多也只能收留你一夜。1997年的时候，我在街上遇到了暴力袭击，因此失去了左眼。现在，我有了住处，但是就算我还年轻，我还是在为当年的街头时光付出代价：我的腰部有骨关节炎，我经常有肌腱疼痛的毛病，另外我也经常会得支气管炎。尽管如此，我还是比以前好多了，因为我现在生活稳定了，家里的钥匙总是在提醒我这件事。但是，我当年大多数朋友都因为露宿街头的的生活造成的后果而离世了。一个稳定的住处和妥善的照顾，应该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才对。

Sophie, 50岁





Yannick

我在街头住了差不多两年，住在桥下的一个帐篷里。有一阵子，我发现我的视力开始变差了。我请了一名救助人员陪我一起去医院，在那里，我得知我得了青光眼。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问了这个病能不能治疗，她们告诉我不行，已经太晚了，病情已经太严重了。从那时开始，我就的视力就逐渐下降。那时我还是住在帐篷里，我必须要滴眼药水，这是很困难的。如今我住在一个收容中心。但是我的眼疾阻碍了我结交中心里以及外面的朋友。社交是很重要的，这对我的信心和情绪都有影响。

Yannick, 36岁

